

# 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探讨

## On the Spee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

陈国阶

(中国科学院、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,研究员 成都 610041)

经济发展速度既是公众关心的问题,又是曾被附上浓厚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。我国风风火火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历程是一条受速度牵动、左右、鞭策和困扰的波动曲线。为着高速度而又被高速度引入歧途,有之;以“革命”误速度,失去大好发展时机,有之;快一下,慢一阵,更有之。但总的说来,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是几十年来的主调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

了我国从领导者到广大群众要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。这是几十年来执着的追求,是一种伟大的力量,是民族奋起的象征。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要不要高速度,该不该有高速度,而在于要什么样的高速度,高速度的愿望如何真正变成科学的、成熟的经济决策与实践,变成持续发展的现实。

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的来说是快的,成绩是卓著的。从表1可以看到,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,而且与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日本和亚洲“四小”相比也毫不逊色。

表1

| 项目  | 工业增长速度           | 国内生产总值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年平均增长%    | 指数(以上年为100)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时间  | 1960~1982年平均年增长% | 1970~1982 | 1983        | 1984  | 1985  | 1986  | 1987  | 1988  | 1989  | 1990  | 1991  | 1992  |
| 世界  | 4.5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中国  | 9.5              | 5.6       | 110.2       | 114.6 | 112.9 | 108.5 | 111.1 | 111.0 | 103.9 | 105.0 | 107.3 | 112.0 |
| 美国  | 2.5              | 2.7       | 103.7       | 106.8 | 103.8 | 103.0 | 103.5 | 104.6 | 103.0 | 100.9 | 98.8  | 101.8 |
| 日本  | 7.4              | 4.6       | 103.2       | 105.1 | 104.7 | 102.7 | 104.6 | 105.7 | 104.8 | 105.5 | 104.5 | 101.6 |
| 加拿大 | 3.0              | 3.4       | 103.7       | 106.1 | 104.6 | 102.9 | 104.3 | 105.5 | 102.3 | 100.8 | 98.3  |       |
| 英国  | 0.2              | 1.5       | 103.7       | 101.8 | 103.8 | 103.5 | 104.4 | 103.9 | 102.0 | 98.9  | 97.8  |       |
| 原西德 | 2.8              | 2.4       | 101.5       | 102.8 | 102.0 | 102.3 | 101.8 | 103.7 | 104.0 | 104.0 | 103.6 | 101.5 |
| 法国  | 3.5              | 3.2       | 100.7       | 101.3 | 101.9 | 102.3 | 102.4 | 103.9 | 103.7 | 102.6 | 101.2 |       |
| 意大利 | 3.8              | 2.8       | 101.1       | 103.0 | 102.6 | 102.6 | 103.0 | 104.2 | 103.2 | 102.4 | 101.6 |       |
| 瑞士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102.9 | 103.9 | 102.3 | 99.9  |       |
| 泰国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07.3       | 107.1 | 103.5 | 104.5 | 108.4 | 111.0 | 110.4 | 110.4 | 107.5 | 107.2 |
| 韩国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11.8       | 109.4 | 106.9 | 112.4 | 112.0 | 111.5 | 106.1 | 108.7 | 108.3 | 104.9 |
| 台湾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107.8 | 107.3 | 105.0 | 107.2 |       |
| 新加坡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08.2       | 108.3 | 98.4  | 101.8 | 109.4 | 111.1 | 109.2 | 108.3 | 106.7 | 105.6 |
| 香港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108.3 | 102.8 | 103.2 | 104.2 | 105.2 |
| 埃及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106.4       | 106.0 | 112.1 | 109.1 | 106.4 | 106.2 | 105.3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巴西  | 7.6              | 1.2       | 96.6        | 105.0 | 108.3 | 107.5 | 103.6 | 99.7  | 103.6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
但是,从高层次、长远发展的观点上看,我们不能不警觉到,我国几十年来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既不是顺利的,也不都是健康的。它带来了或隐藏着

大量深层次的问题,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或上新台阶的制约因素,乃至重大障碍。

## 1. 发展速度的资源与环境代价

几十年来,我国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以消耗容易利用的资源为代价的,是按资源无价、环境无价、不计入经济(产品)成本的“优惠”条件进行的。现已导致几个严重后果:

(1)严重的环境污染。我国的环境污染现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五、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期的水平。所不同的是,发达国家自 70 年代以后,对环境污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,已取得突破性进展,大的污染公害事件已不再出现或明显减少、减轻。而我国从五、六十年代开始,污染日益严重,至今不仅未能很好整治,而且继续恶化的趋势尚未控制住。现每年由于三废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约达 500 亿元。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已构成尖锐矛盾。

(2)资源过度消耗。50~90 年代,世界经济技术

水平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,各国(特别是发达国家)的单位 GNP 能耗、水耗、原材料消耗已大大降低。可是,我国产业体系各部门的物质消耗不仅没有降低,而且呈上升趋势(表 2)。这表明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,在提高资源利用率、降低资源消耗方面,没有实质性进展。这是违背产业发展一般规律的,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史(特别是现代产业史)上,是罕见的。

由于几十年的积淀,使得我国当代产业不仅单位 GNP 的能源、资源、水源消耗高于发达国家几倍,更严重的是导致资源的枯竭、危机。现在水源发生危机,能源(特别是石油)短缺,矿石资源后备不足已成为一个严酷的事实,而土地资源锐减与人口增加的矛盾日益加剧,更令人担忧。

表 2 我国各部门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  
(以总产值为 100)

| 时 间           | 物质生产部门合计 | 农业   | 工业   | 建筑业  | 运输业  | 商业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“一五”时间平均      | 44.3     | 26.2 | 65.6 | 64.4 | 33.6 | 23.4 |
| “二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50.8     | 24.0 | 65.4 | 67.0 | 36.0 | 24.6 |
| 1963~1965 年平均 | 48.6     | 25.4 | 64.5 | 66.4 | 38.4 | 36.0 |
| “三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48.1     | 23.7 | 63.6 | 69.6 | 37.8 | 26.2 |
| “四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51.8     | 24.5 | 63.5 | 72.9 | 38.9 | 31.0 |
| “五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56.1     | 28.4 | 65.4 | 76.2 | 43.6 | 39.7 |
| “六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57.3     | 30.5 | 66.9 | 75.6 | 47.7 | 44.7 |
| “七五”时期平均      | 60.9     | 34.3 | 70.7 | 73.4 | 45.1 | 36.7 |

资料来源:国家统计局,中国统计年鉴,1991。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。

(3)自然生态系统遭严重破坏。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和薄弱的生态意识,伴随资源的消耗与浪费,自然生态系统日趋脆弱。当前,我国森林锐减、草场退化、沙漠扩展、土壤侵蚀、水土流失、物种与生态系统多样性减少、自然灾害加重等趋势,加上上述的污染和水源危机等,都是几十年对资源与环境的欠债的后果。可以说,我国的经济速度实质上是以高昂的生态赤字、环境赤字、资源赤字作垫支的,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。

更严重的是,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形成巨大的惯性。至今,从决策者的思维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,从产业体系到产业政策、企业经营,都还深深打着这种历史惯性的烙印,自觉不自觉地干着破坏环境、浪费资源的“业绩”。这种状况短期内还很难有大的改变。

## 2. 发展速度与效益不同步

几十年来,世界科学技术已取得巨大成就,当代的企业设备、技术经济水平、管理人员素质等较之 50 年代,都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世界各国的经济效

益凭借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已大大提高。产出投入比成倍增长。可是,我国恰恰相反。多年来,总体的经济效益没有提高,反而降低,并且往往是发展速度越快,经济效益越低。

从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上看,不论是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、利税,还是资金利税率、产值利税率、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流动资金、可比产品成本等,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,不仅没有改善,而且呈恶化趋势。1990~1992 年各项指标比不上 1952 年的水平。例如,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,1952 年为 25.1 元,1962 年为 15.8 元,1972 年为 32.4 元,1982 年为 22.2 元,1990 年为 12.9 元。成本利润率,1952 年 19.2%,1955 年 22.1%,1965 年 20.9%,1975 年 14.1%,1985 年 13.2%,1990 年 3.2%,1992 年 4.6%,后两年均低于贷款利率。

再从企业亏损额上看,50~60 年代没有统计资料,1972 年全国亏损额 32.25 亿元,1982 年增至 47.57 亿元,1986 年 54.49 亿元,1987 年 61.04 亿

元,1988年81.92亿元,1989年180.19亿元,1990年348.76亿元。企业亏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负担。

### 3. 高速度发展与产业进步不协调

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主要以扩大外延再生产为特征,忽视扩大内涵再生产,没有或较少在提高产业层次上下功夫。50年代,我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,现代工业幼稚,扩大外延生产,投入较大比例的资金建新厂、铺摊子是必要的。但80年代以后,庞大的产业体系已形成,仍然一味追求扩大外延再生产,而对产业体系的结构优化,技术改造,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很不力,严重滞后,造成与产业现代化的距离拉大,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相悖。

(1)产业结构畸形。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工业上,农业和第三产业相对滞后。至1992年,第三产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27.2%,远低于发达国家65%左右的水平,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也低得多,如印度1988年为46.3%。我国工业产值中,重工业产值约占一半,比重偏大;属资源消耗型的采掘业、原材料工业又占重工业产值一半以上;制造业和深加工工业产值仅占重工业产值的46.3%(1990)。轻工业产值中有70~80%依赖对农副产品的加工。因此,整个工业体系偏重,偏笨,偏粗,运输量大;在经济体系中,基础设施、能源、交通、通讯、科技等投资长期不足,发展严重滞后,与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不协调,成为“瓶颈”。

(2)产业离规模、集约经营要求较远。目前,全国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达50.44万个(1990),其中大型企业仅1.35万个,占总数的2.7%;而乡办企业达22.87万个,占总数的45.34%。企业多而分散,乱而重复,水平低,产量低,产值低,效益低,消耗高,成本高,结构性产品过剩严重。不能构成规模、集约生产,难以上水平、上档次,已成为我国产业的致命弱点。例如,全国产值较高的汽车行业,共有汽车厂126座,企业单位4000个,1992年汽车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,但也仅约百万辆,还达不到世界公认的一个汽车厂起码的效益经营规模,产品无论质、量、价都无法在市场上与世界汽车行业竞争。

(3)产业技术经济落后。现全国工业技术只有20%左右达到国际60~70年代的水平,大部分属于50年代或本世纪上半叶的水平。国营企业中拥有自动化、半自动化生产线的仅占总企业数的2.5%。全国重点企业生产设备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不到15%。这反映出经济高速发展没有与技术进步相结合,主要不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投入而取得的,发展是不稳固的。

### 4. 高速度与通货膨胀周期

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强烈震动的特征。往

往是一个高速发展期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调整期、低谷期,甚至从超高速一下子跌落为负增长,引起对全国各个领域的严重干扰。大体的模式是,高速度发展进一步加深早已不合理的产业结构,使之更加畸形;进而带来能源、资源、原材料的短缺,交通的梗塞,浪费的增大,投资的失控,环境的破坏,土地的废弃,产业效益的降低;随之物价上涨,资金紧缺,相应地货币发行量大增,通货膨胀也就跟踪而至。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,通货膨胀率无法计算,实际的代价是上千万人的生命悲剧。1987~1989的高速度,使这三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7.3%,18.5%和17.8%。1992年全国经济增长率为12.8%,物价上升5.4%;199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14.1%,物价上升8.6%。弄不好1993年通货膨胀率又可能达到两位数。因此,如何使经济发展速度能给居民生活带来实惠,而不给或少给居民带来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,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。

### 5. 高速发展对农业的“遗忘”

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伴随着农业的衰退或减产,造成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失衡。如1956~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由642亿元增至704亿元,而农业总产值却由610亿元下降至537亿元。1958~1960年大跃进三年,工业总产值从1083亿元增至1483亿元和1637亿元,而农业总产值却从566亿元下降至497亿元和457亿元。1976年工业总产值3278亿元,1977年达3725亿元;相应地农业总产值由1258亿元下降为1253亿元。同样,1988~1989年工业高速增长,带来农业(特别是粮食)生产的徘徊和下降,导致城市严重的“菜篮子”问题。1992年以来,农业的形势又严峻了。相反,在工业衰退或发展缓慢时期,农业却得到较稳定增长。如1960~1963年,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637亿元逐年下降为1062亿元、920亿元和993亿元;而农业总产值却从1960年的457亿元逐年上升至559亿元、584亿元和642亿元。同样,在1966~1968年,工业产值连年下降,而农业产值依然逐年提高。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往往被片面化,在许多情况下违背了整体协调、求效率、出效益的原则。

## 二

列举了上述高速度对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的问题,不是说我们不能高速度,更不是说不要高速度。相反,无论从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看,都希望我国的经济能有较高的发展速度,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。当前需要明确的问题是,什么样的速度才算高速度?高速度的内涵是什么?我国为什

么会出现多次好心办坏事,欲速却实不达的现象?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高效率的、持续发展的高速度?探讨这些问题较之简单地对高速度进行褒或贬更有意义。

应该说,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或遗留的问题,不少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的影响,但也有不少与我国多年存在的若干不正确、不准确、不精密的决策惯性有关。因此,探讨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,首先要澄清几个问题:

### 1. 高速度的标准

现在很难说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标准,但起码有国际经验可供借鉴。有一点可以肯定,速度不是越快越好。全世界经济发展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多年(10年以上)平均发展速度都没有超过10%,个别年份达到11%或12%,最高的达到13%(泰国,1988年)<sup>①</sup>,但一般很难连续维持3年发展速度在10%以上。对于美、英、法、德、加、意、澳和其他西欧国家来说,年经济增长率能超过5%的甚少,一般能连续几年保持增长率3~4%就算是经济“复兴”了。因此,对于超过10%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能说就一定有问题,但起码说明已超常规,值得警惕。

### 2.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

经济发展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,功能和效益的提高,能耗、水耗、资源消耗的降低,经济技术的进步,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,企业素质的逐年提高,市场的持续开拓,基础设施的改善,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。因此,经济发展不能只归结为GNP的增长,更不能只追求工业总产值的增长,其最终体现应该是社会、经济、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和质量的提高。如果单纯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经济发展,那么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高于西方发达国家,就是至1989年的整个8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后者。然而,其经济却面临崩溃而使国家解体或换代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

### 3. 提高发展速度不等于就是扩大外延再生产

实际上,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主要地不是靠扩大外延再生产,而是靠科学技术进步,靠提高产业中科学技术的含量。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,有70%是以技术的投入实现的。我国之所以在发展速度上经常出毛病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投资方向不准确,经济增长不以扩大内涵再生产为主,不以提高原有产业素质为主,而一味追求建新厂,搞重复建设,致使多年一贯的产业投入大,产出低,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。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。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,不仅经济发展上不去,持续不了,就是资源、环境也无法承受一味扩大外延再生产的冲击。

### 4. 发展速度是一种经济规律

虽然人的决策因素和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,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受众多因素的影响,有其自身的运动过程和规律,许多情况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因此,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,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是一回事,能否真正实现高速度和持续发展是另一回事。良好的意愿可以化成动力,与经济规律相结合,促进经济发展。但良好的意愿不能代替经济规律,更不能违背经济规律,否则不仅于经济发展无益,严重的还可能造成经济灾难。

即以现在经常所说的宏观调控而言,虽然是决策者与领导者对某一目标的意志的表现,包含有决策者和调控者的主观意识、价值取向、才能等因素,但也不是纯粹的主观意志的行为。不仅调控的目标不能是主观随意确定的,而且调控的过程,调控的方法也不能是纯意志的,都要以客观经济规律为依据,受规律的约束。调控的目的无非是要使经济行为与客观规律相符合,而不是别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调控是一种客观需要,也是一种摆脱盲目状态的科学行为。只有这样来认识,才不会使宏观调控蜕变为瞎指挥或个人主观的“独断”行为。

### 5. 对经济发展速度要给予一定规范

虽然对什么是最合理的发展速度还难以明确定义或严格定量说明,但合理的发展速度起码应满足一定的要求。

(1)速度宜适当的的增长。负增长、零增长或低速增长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,但也不能主观盲目地去追求高增长率。增长率也不是越高越好。笔者认为,能趋近或达到世界近几十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速度,并使之不要产生太大的波动或反复,就应该算是较理想的速度。

(2)速度与效益的统一。高速度应是在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,而决不应以牺牲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为代价。高速度应给居民带来较宽松的生存、生活和生态环境,而不是带来生活压力和生态冲击。

(3)近期速度与持续发展的统一。要求发展比较平稳,近期的速度与长远的持续发展能基本相衔接,起码在10年、15年或20年内不出现零增长、负增长的年份或发生灾难性倒退(战争或特殊意外因素除外)。

(4)速度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。高速发展不要超过环境容量,不应引起环境质量的退化;不应增加生态赤字、环境治理投资赤字,起码要控制住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。

(5)速度与节约资源同步。不能以牺牲资源、浪费资源、提前耗竭资源为代价。发展要与可更新资

<sup>①</sup> 据亚洲发展银行资料,1991,数字与表1有出入。

源的更新能力和水平相协调,与不可更新资源的代替或供应渠道相衔接。高速度应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体系。

(6)速度要与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。高速发展要有利于产业体系的完善和进化,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提高。速度要与产业的基础结构相协调,起码不能加深产品结构性过剩,加大发展“瓶颈”,加剧产业畸形。

诚然,任何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理想状态中运行,即使是经济奇迹也还会出现许多不协调、不平衡、偏差、隐患等。但是,我们应该有意识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向较理想的境况引导,通过不断的探索、调控,避免大的失误,避免出现上述的种严重失衡或失调,较为接近持续发展的模式,使之较符合历史发展潮流,是应该努力争取的。

### 三

回顾我国几十年来的实践,可以看到,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有几个倾向性的问题反复出现,对经济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干扰,值得我们警惕。

#### 1. “一窝蜂”的做法

往往一提加快发展速度就仅被理解为高的经济增长指数,高的生产指标,而实现这些高指标又往往仅寄希望于扩大外延再生产,铺新摊子;不管条件如何,抢着上,到处上,乱上,形成相互攀比、仿效;不分东西南北,不管区域差异,几乎都是同一种思路,同一套方法,同一个模式。我国经济建设几次有利的发展时机就是被这种做法冲击掉的,并留下许多严重后遗症。当前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下决心铲除这种毛病,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。

(上接第59页)

建议,要求在10年内国内支持和关税削减75%,出口补贴削减90%。凯恩斯集团13个农产品贸易国(加、澳、智利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匈、印尼、斐济、哥伦比亚、马来西亚、乌拉圭、泰国、菲律宾)的建议,基本上与美国的建议相同,但加拿大对进口机会问题有些不同意见。欧共体则于1990年10月建议,在10年内支持水平比1986年减少30%。

在乌拉圭回合开始不久,净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成立了小组,提出贸易自由化将导致粮食进口价格上涨,因此建议以优惠粮食销售、财政援助、改善市场准入条件,增加粮食援助或减少债务偿还数额等形式进行补偿。1990年12月召开的布鲁塞尔部长级会议,曾经提出一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折衷建议,规定在出口补贴、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措施三个关键领域中削减30%,但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。在关贸总协定总干事与主要国磋商的努力下,

#### 2. “热”容易,“冷”却难;“热”得快,调控反应慢

每次的高速“热”都只有一个很短的启动过程,一般是先由决策者提出,具有较强的政治号召力,很容易产生全国动员的优势。这本是好兆头,但由于政治色彩太浓,加上各级决策者普遍存在的重速度、轻效益的决策偏好和显示自身政绩的急功近利的需要,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层层加码的热潮。许多隐忧、不利因素往往被掩盖,只准就热谈热,难得热中思冷。因此,即使已出现不良征兆,也不能引起警惕,不能及时将消极影响消除于萌芽状态,而往往是到了问题成堆,矛盾激化时,才采取急煞车的办法,从而引起大的折腾或震动。这在未来,是应该认真汲取的教训。

#### 3. 传统思维的惯性和惰性

我国的各级决策者,战略、规划和计划的制定者、执行者,总的说来,对于计划经济较有经验,对市场经济较生疏;对搬抄国外和别的区域的做法较盛行,对创造性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较外行;对扩大外延再生产较熟悉,对扩大内涵再生产较拘手;对赶热潮、赶速度较感兴趣,对科学决策较冷淡,嫌麻烦;对产值易重视,对效益易轻视;对生产较认真,对生态较马虎;对资金投入较大胆,对技术投入易怯弱;对自身区域和行业较偏好,对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易推托;对资源消耗大手大脚,对教育、培养人才小手小脚;救灾较积极,防灾较消极;对上级领导较负责、耐心,对下属群众常怠慢、轻心。如此等等,积久成习,具有很强的惰性。如若这些方面没有大的改善或转变,要确保我国经济长期、稳定、较高速度的发展,是很难达到的。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

1991年2月开始恢复乌拉圭回合谈判,农业仍是一个单独小组的主题,但农业谈判的进展缓慢,意见分歧较大。

80年代,人们十分关切保护世界环境和保护国内卫生和安全,免受污染和不安全产品的危害,开展了单边、双边和多边活动,研究解决贸易和市场中的环境卫生和安全贸易措施。1979年东京回合的“标准守则”,力求解决卫生安全与环境标准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平衡问题。关于采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点,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一致意见。有必要规定更多的有关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国际协定,来协调经济及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环境卫生和安全重点方面的分歧,使其既符合保护全球环境的需要,同时又努力实现更自由的多边贸易体系。

(责任编辑 蔡 今)